

论张申府的性爱思想

徐仲佳^{*}

【摘要】 张申府的性爱思想是他启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早期性爱思想带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其主要内容是鼓吹极端的性自由、破坏一切束缚;其后期性爱思想则以文化综合主义的文化态度,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性爱思想的依据,在理与欲的关系方面,主张执“中”、情理相济。另外,与大多数革命者不同,他的性爱思想还是其社会改造的重要路向,认为“要换世界,须改人性与变制度”。这一思路在中国现代启蒙运动中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张申府;性爱思想;文化综合主义;启蒙

张申府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位始终热心鼓吹启蒙的哲学家。从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到1930年代中期的新启蒙运动,他一直都是积极的参与者,甚至在1957年那个短暂的春天,他也念念不忘《发扬五四精神:“放”》。张申府曾经这样总结自己一生的爱好:“我有三好:好名、好书、好女人”,而且这三好贯穿至终身^①。当我们检视这位现代哲学家的思想时,能够深刻感受到性爱之于他的重要性。其性爱思想不仅是他哲学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体现了他启蒙思想独特的理路。

一、自由与破坏:早期性爱思想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五四时期,张申府启蒙思想的来源主要是罗素的自由主义。他宣称自己在性观念上是“与罗素一个鼻孔出气”,其性观念的内容是宣扬人的自由、平等与独立。他最初的性爱思想就是以此为基础,结合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当时思想界的唯科学主义倾向而形成。首先,他认为性欲望的满足是人的最基本要求。“须知爱情不过自然界里一种自然现象。他的发露与消灭都有自然不可逃的势子在后边。发的时候不能不发,灭的时候不能不灭”;“我觉着男女的事,最好能够作到大家都

^{*} 文学博士,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571158;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本文为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课题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性爱叙事研究”(HNSK12-34)之阶段成果。

^① [美]舒哲衡:《张申府访谈录》, [美]李绍明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第19-20页。

不以为意,成了家常便饭”^①。很显然,此时张申府受到唯科学主义的影响,把性的自然属性当作性的第一属性^②。其次,他从性的自然属性推导出性自由的极端诉求。他心目中性的理想状态是基于性本能满足的绝对自由。“我们要使人有关系的自由,……就是扯碎圈套,毁掉把人分隔的东西,达到圆满自然,人人都是好相识,相视而笑而莫逆于心的,美的状态。男女关系的自由也可说就是为发展本能的爱好,发展两个赤子在一起可以有的情操,以达于精神之爱,以达于高阁纯洁,深邃闲寂,恳至殷切,长久永恒,与无穷相联结的爱,爱情尊敬相缔合,本能精神共愉快:人人互相尊敬其生活之精神,成群侣而与个人自由无挂碍。得本能之联合而于心和精神之生不凌害。这些事都是优游自然的世界,发达最好的冲动的世界,必需的要质。为此这个关系自由也可叫做一种本能、思想、精神、发展调和的自由;或简叫发展且高尚本能的自由。”^③人的关系既然被认为是发展本能的爱好,那么任何对性的束缚与逼迫都应该被祛除。他甚至把一切道德的、制度的人为限制都视为罪恶的:“婚姻本也是古来传留、霸据、欺伪的制度中的一种。但使吾们明白他的真作用,把对于他的心理改改,这种作万恶源泉的制度有什么不可去,有什么不该去,有什么不能去的?”他昌言要“把几千年的婚姻制度从根废除”^④。婚姻制度都要从根废除,更遑论道德?制度与道德废除了,性作为人的自然属性就应该只受自然法则的节制。因此,他“相信男女交媾是与饮食一类的事,只应受与饮食应受的类比的节制”。这样的推导使得张申府甚至成为恋爱的反对者:“我又信欲为基础,爱乃皮毛;很不喜欢人过言什么爱;以为那至少,一方是幻念,一方是欺骗,总之不脱迷信”^⑤;“我相信性的自由,我因此绝对反对恋爱。我的意思中,恋就是恋恋不舍的意思。这种情景,是根本与性的自由不相容。性的自由只容爱不容恋,要性的自由也只有爱而不恋。如果总是如胶如漆恋着,那可还有什么自由可言”^⑥。为了达到性的自由,甚至连“恋”也不相容,足可见张申府在性自由诉求上的极端性。

张申府的这一观点与当时大多数思想者是相异的。当年,胡适、周作人、周建人、章锡琛、瑟庐等人虽然也从唯科学主义的角度出发肯定性的自然属性,寻找性欲望满足的合理性,同时他们也认可性自由的鼓吹在中国传统礼教秩序的破坏中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抹杀性的文化属性。恰恰相反,他们借助性自由的鼓吹在文化领域所做工作正是强调性的文化属性。他们当时积极鼓吹的是瑞典女权主义者爱伦凯(Ellen Key)的“恋爱结婚论”,呼吁“恋爱自由”、“离婚自由”等观念,恋爱在他们的信念里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正当的恋爱,乃是灵肉合致复杂而且高尚的。这种恋爱是人生的根本,人人都应该互相靠着这种恋爱感受幸福;在这种恋爱里所感受的幸福,便可构成社会的幸福。凡种族的改良、人生的向上进步,一定要个人能够感受恋爱的幸福,方才可以实现。”^⑦他们虽然也激烈地反对旧的婚姻制度、抨击偏于男性的片面的性道德,但他们仍然相信性道德有存在的必要,只是这种性道德的约束应该是双方面的、出于个人的自由意志的。例如周作人在谈到贞操时就认为:“一个人如有身心的自由,以自由别择,与人结了爱,遇着生死的别离,发生自己牺牲的行为,这原是可以称道的事。但须全然出于自由意志,与被专制的因袭礼法逼成的动作,不能并为一谈。”^⑧胡适也抱有与周作人相同的观点:“夫妇之间的正当关系应该以异性的恋爱为主要元素;异性

①张申府:《报凯明先生》,《张申府文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8页。

②[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简言之,唯科学主义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都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唯科学主义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在与科学本身几乎无关的某些方面利用科学威望的一种倾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页。

③张申府:《就来的三自由》,《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15页。

④张申府:《男女问题》,《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21页。

⑤张申府:《报凯明先生》,《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78页。

⑥张申府:《性的艺术同性的自由》,转引自[美]舒哲衡《张申府访谈录》第92-93页。

⑦瑟庐:《爱伦凯女士与其思想》,《妇女杂志》第7卷第2期(1921年2月)。

⑧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

的恋爱专注在一个目的,情愿自己制裁性欲的自由,情愿永久和他所专注的目的共同生活,这便是正当的夫妇关系。”^①从这种差别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同属自由主义阵营,但张申府早期的性爱思想却带有更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与这种性自由的极端诉求相适应,张申府鼓吹人的独立、自觉是性自由的基础。在这一点上,他和当时多数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是相同的。不过,他从性自由的极端性出发,对女性解放提出了一些超越绝大多数启蒙者的观点。他反感当时男性启蒙者动辄呼吁“妇女解放”。他认为这种居高临下、包办代替的解放“大不当”：“其实‘女子解放’这个名词乃是大大的一个不妥。……解放,解放,细剖析起来,实含着轻侮的意味。解放与被解放者,必是立于不平等的地位。两朋友若是互相敬重,绝没有这个说把那个解放的。……解放,只有向自己说,是要得的。什么是自己解放自己?这就是要冲破一切罗网、打碎一切偶像、排掉一切权势、典重、常习、惯例;不但不可做有形的奴隶,更要紧的不作无形的奴隶;……个体都有他自有的价值。”^②他希望妇女能够从把“生建立在性上”的依附状态走出来,生出一种“充分的独立不依的脾气”^③。独立不依,正是当年启蒙运动视为“人”的最基本特质。张申府自始至终都把这一点看作是启蒙的最重要目标。在1930—194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他对这一目标的坚持也是他与陈伯达、艾思奇等左翼鼓吹者最大的差异。他认为新启蒙运动“第一要自主”。他所说的自主,不仅是民族自觉、独立,也是个人的自觉、独立,而性自由不过是这种独立、自觉的个体的一种高尚本能的自由罢了。

从性作为人的自然属性出发,推导出性的合理性;由这一合理性再推导出极端的性自由;从极端的性自由推导出人的独立。这是典型的五四时期启蒙思想脉络:“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④

二、情理相济:文化综合主义阶段的性爱观

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张申府的哲学思想发生了重要的转向,进入了所谓文化综合主义阶段^⑤。在1937年开始的新启蒙运动中,他明确提出:“孔子、列宁、罗素是可以合而一之的。”即试图把中国的儒家思想传统与西方的自由、民主、科学以及唯物辩证法等思想资源加以对接,形成新的启蒙文化^⑥。这一“会通中西,熔铸古今”(汤一介先生的评价)的文化取向,张申府后来把它总结为“实、活、中”。所谓“实”,即“求实”;所谓“活”,即辩证的观点;所谓“中”,即“中庸之道”^⑦。

张申府的文化综合主义是从重新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他认为“五四”是单纯的,在学问思想上“也还幼稚的可观”,“不免浅尝辄止,不肯认真深造”^⑧。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以及全盘西化的文化策略,进行了批判性反思:“那时有两个颇似新颖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德赛二先生’。我认为这两个口号不但不够,亦且不妥。……我以为对这两口号至少都应下一

①胡适:《胡适答蓝志先书》,《新青年》第6卷4号。

②张嵇年:《“女子解放”大不当》,《少年中国》第1卷第4期。

③张申府:《妇女与革命》,《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141页。

④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56页。

⑤张申府:《第三文化之建设——一段旧感重发》:“今日欲超出两旧文化而建一种第三文化,乃在顺‘物质’之可能,先就物质的基础,而引之趋于理想。为理想之形成应将东西所有旧有的东西,都加以估重,评衡,及别择。一脚踢与一兜包的办法,是同样地要不得的。”该文原载1925年6月22日《京报副刊》,收入《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63页。

⑥张申府:《家常话二九九》,《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434页。

⑦[美]舒哲衡:《张申府访谈录》,第246页。

⑧张申府:《五四当年与今日》,《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428—429页。

转语。就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①他所谓“打到孔家店”，指的是打倒对孔子的崇拜；所谓“救出孔夫子”，指的是认真研究孔子的真精神，把儒家的思想引入新启蒙运动，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使其获得普世的价值。“吾深相信……（孔子的道德系统）被除其时代限制与传统误会，实在大大可取。”^②张申府在其后期思想活动中一再申说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思想的现实意义。他把孔子的“仁”、“忠恕”等原则阐释为新启蒙运动的理性原则：“仁及忠恕之道都是理性之道。忠，尽己为人。仁，首在活灵灵地感到他人。所以，仁及忠恕，都是假定有他人，都是承认他人，容许他人，重视他人的。没有理性，这个如何作得到？”^③在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情绪中，他甚至以为“中国有其可以立国处，有其特别值得立国处。”而这足以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原因恰是中国文明是一种“人的文明，是生的文明”^④。因此，他把“仁”与“美”视为战时教育的“最高理想”。另一方面，张申府的文化综合主义倾向于以儒家思想与西方现代思想来互相阐释。在他的新启蒙思想中，“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与“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二者并举就是他的文化综合主义的选择。关于这一点即使在晚年他也坚定不移地相信并颇为自得：“就算罗素不承认他的学说接近孔子，但我的哲学能把他俩拉在一起。我是他们的桥梁。”^⑤

张申府后期的性爱思想也带有文化综合主义的新内容。即如舒哲衡后来所看到的，“张申府喜欢从孔子那里寻求他的性论的支持。他经常告诉我：‘圣人知道先满足肉体需要，然后才追求精神生活的重要性。’”^⑥从早期的鼓吹极端性自由到寻求儒家思想的支持，这一变化首先出现在1920年代后期，张申府逐步舍弃了早期性观念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开始宣扬理性对性欲的节制。“理性是民主的精神。……就是反成见，反偏见，反独断，反武断，反迷信，反盲从，反放纵感情，反任逞嗜欲，反意气用事，反一切过分，失所，不当。理性不是不要情欲，只是要加以调理，使有条理。”作为文化综合主义的选择，这种节制情欲的理性不仅仅来源于罗素所代表的西方思想，而是更多的倾向于中国儒家哲学思想中的“良知”、“情理”^⑦。

在东西方哲学中，普遍存在着理欲之间的对立关系：“西方哲学的根基就存在于两件相关的事物之中：欲望与理性的斗争”^⑧。中国的儒家、道家和佛教思想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禁欲主义倾向。不过，理与欲在前现代社会不构成紧张关系，理性对欲望有着绝对的支配权。在现代社会里，个人的性权利成为人的自由意志的一个表征，性蕴涵着自由的内容，性权利的争夺成为个人自由与权力斗争的前沿，理欲之间的紧张关系才被凸现出来。中国儒家礼教秩序是以孝慈为核心的差序伦理，对于处于人伦秩序下位的青年和女性的权利特别是性权利是漠视、压抑的。通过1918—1919年的“贞操问题”的讨论，性的权利意识和性自由思想成为那个时代“个人的发见”的一个重要符号^⑨。张申府带有浓厚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性自由诉求，正是反映着那个时代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者与传统礼教秩序斗争的激烈性。到了1920年代中期，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新文化界出现了一些对传统文化重新评价的声音。在这一对传统文化重新评价的过程中，理欲的紧张关系也成为新文化界注意的中心问题之一。以周作人为例，他在参与思想革命之初，传统文化被认为是压抑个性的罪魁祸首而受到他猛烈的抨击。他对那些以卫道为己任的道学家毫不留情地进行抨击：“我也喜欢弄一点过激的

①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189—190页。

②张申府：《家常话三〇〇》，《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441页。

③张申府：《家常话二八四》，《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423—424页。

④张申府：《我相信中国》，《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203页。

⑤[美]舒哲衡：《张申府访谈录》，第139页。

⑥[美]舒哲衡：《张申府访谈录》，第61—62页。

⑦张申府：《家常话二二七》，《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392—394页。

⑧[英]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马海良、赵国新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67页。

⑨徐仲佳：《论〈新青年〉“贞操问题讨论”的现代性意义》，《德州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思想,拨草寻蛇地去向道家寻事。”^①自1920年代中期起,他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性爱思想的依据。他追慕千年前的中国文化“一时有臻于灵肉一致之象”,而追求一种“禁欲与纵欲的调和”的“生活之艺术”。周作人认为,现在要做的就是复兴中国千年前的“礼”,“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即“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②。他承认“儒家的现世主义”是对的。他甚至设想通过科学知识的传播把性的迷信和假道学中的淫逸思想驱除干净,使中国人在传统的基础上获得新生。1930年代以后,他更自觉地从原儒、异端、小传统中剔抉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物理,来作为接通中西方关于性爱思想的桥梁^③。

周作人的例子并不是孤证。实际上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新文化运动已经从启蒙期的重在破坏、“弃取未定”的状态进入“破坏事业已告终”的全盛期。在这种“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的状态下^④,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开始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周作人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些所谓的激进派对之前矫枉过正的文化策略的反思。其与那些被称为保守主义者所一直试图在文化延续性上重新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新意义的努力可谓殊途同归。但是,与保守主义者不同,他们是在对新文化运动进行理性反思的基础上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重建上的意义,而非以传统文化为本位的重新阐释。张申府后期性爱思想的变化也属于这一理性反思的潮流。在这一潮流中他的文化综合主义主要表现为以儒家的人情物理说来调和理欲之间的紧张关系,主张执“中”、情理相济:“理者,情之不爽失者也。未有情不得而理者也。无过情,无不及情,之谓理。理者,存乎欲者也。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后欲得遂也,情得达也。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权之而分厘不爽,是谓理。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君子亦无私而已矣。不贵无欲。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为而归于至当不易之谓理。”^⑤张申府后期性爱思想中的中西文化调和倾向在1940年代变成了对婚姻、女性保护的制度保障诉求。这一点与他1940年代中对民主制度与自由之关系的认识相关:“我深信,没有组织或组织不好,是不能保障人人的自由的,尤其不能保障人人这种发展的自由,尤其是不能给人人以这种发展的自由的机会。组织不是束缚或阻碍自由的。一个乱七八糟的社会必不会使得人人都自由”;“与其说中国今日需要自由,无宁说中国今日更需要组织”^⑥。因此,在《宪法与妇女》(1944年)一文中,张申府一方面宣扬宪法的第一原则应该是“男女绝对平等,一样都得尽其才力”,男女双方都不应该以性别差异予取予求;另一方面又宣扬,宪法应该在男女绝对平等原则上打一个“两重折扣”:在历史的、自然的两方面对女性给以相当的保护性考虑。虽然张申府没有在这篇文章中正面申说宪法在婚姻制度上的立法原则,但是从他提出的这个“双重折扣”中我们能够推想出张申府一定不会再鼓吹取消婚姻制度了吧。

从性自由的极端诉求到1940年代对婚姻、女性保护的制度性保障的诉求,张申府的性爱思想变化显示出中国新文化界在中/西、传统/现代两种文化维度上寻求文化重建的轨迹。

①周作人:《与友人论性道德书》,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5页。

②开明:《生活之艺术》,《语丝》,第1期(1924年11月17日)。

③周作人《关于假道学》:“从假道学里抽去淫逸不净的思想,古衣冠便噗的一声掉在地上,只剩了赤裸裸的人,那就是真的活人;只可惜这个法术是几乎不可能地不容易罢了。我们的时代比较好一点,有机会得到些科学的知识,破除些道德上的迷信,自然不会再中毒了。”《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第88页。

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3页。

⑤张申府:《所思一二〇》,《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124页。

⑥张申府:《自由与组织》,《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517、513页。

三、“变人性”与“改制度”：性爱思想的启蒙理路

张申府性爱思想的独特性除了作为核心观念之一贯穿于其启蒙思想的始终外,还体现在作为社会改造方案重要路径的设计上:他把人的性观念的变化看作是人性改变的重要途径,是一种与制度变革相配合的社会改造。舒哲衡认为张申府在1922年的一篇文章《男女问题不成问题的解决》中就已经提醒当时醉心于阶级革命的人士注意,“如果社会革命不伴以——亦即建基于——意识的革命,那么这个革命是没有意思的。革命必须从最基本的男女关系开始。”^①舒哲衡的看法指出了张申府社会改造方案的重要方面。但是,这并不是张申府社会改造方案的全部。在1920年代,列宁主义信徒与启蒙者的双重身份使得张申府在社会改造的途径选择上显示出矛盾性。一方面,作为列宁主义的信徒,虽然张申府把社会改造的终极目标设定为“生产共有、分配共管,无阶级、无国、无家、无政府的共产社会”^②,但他又认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革命和开明专制(劳农专政)^③,强调共产党的真谛在以“纪律”去实现“精神贯一”^④。在这种社会改造方案中,个人的行动必然要受到党的纪律的约束,实际上,革命常常和禁欲主义结盟。另一方面,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者,张申府又与当时大多数列宁主义的信徒有明显的差异,而更倾向于周作人、张竞生等为数不多的几位性启蒙的鼓吹者。他们的以人性改造为核心的启蒙方案在他们的思想系统中都表现为以性启蒙来作为社会改造方案之助。张申府认为把社会改造的目标全盘寄托在以阶级革命为手段的制度革命上,是不足取的:“制度一改,人性立变,乃是不可能的事。”社会改造,要靠人性改变与制度革命相结合、“革命与教育相成”^⑤。张申府的这一思路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罗素的人性解放思想有很深的渊源。他认为:“罗素的道德哲学以欲为出发点,旷古以来,最为不伪善,不自欺。”^⑥因此,张申府相信:“人欲越遂的多,则世界要越好。”^⑦在这一社会改造方案中,立人(包括性自由)是其核心。在张申府复杂的思想中,立人与禁欲主义的纪律之间必然会形成鲜明的矛盾性。1925年,张申府退出中国共产党,表面原因是与蔡和森等人政见不和,但如果从其思想资源的矛盾看,这一事件及其在1948年不合时宜地“呼吁和平”、1957年呼唤发扬“五四精神‘放’”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在张申府身上,其深层原因都源于其思想深层矛盾性。因此,有研究者认为:“这种内心的矛盾,是他难以纾解的,也是他的悲剧的根源。”^⑧

张申府并没有试图摆脱他社会改造方案中的矛盾性,而试图调和这一矛盾性。1925年退党之后,他没有完全离开自己之前的工作。虽然他自觉着“不适宜集体生活”,但他仍然自认为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把“批评性思想”当作他的“避难之地”,仍然积极地从事思想革命的工作^⑨。他声称自己所要做的是使“思想开明”、“人性改造”:“我现在所要努力,究不在单纯的赤化上。我信,要换世界,须改人性与变制度。我是在改人性方面努力,要从人性上打点改人性的预备,从旁帮那直去变制度的。这做法,自由由于以为人性的内幕不彻底地明白了,一旦变成俄国那样子,危险至少也要同今一般

①[美]舒哲衡:《张申府访谈录》,第60页。

②张申府:《中国共产党与其目前政策》,《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44页。

③张申府:《英法共产党——中国改造》,《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22页。

④张申府:《今日共产党之真谛何在》,《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46、47页。

⑤张申府:《报凯明先生》,《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75页。

⑥张申府:《所思二》,《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75页。

⑦张申府:《所思二十四》,《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155页。

⑧雷颐:《中国现代史上的张申府》,《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⑨张申府:《自白》,转引自[美]舒哲衡《张申府访谈录》,第190页。

无减。”^①因此,他赞成周作人的“想对于思想的专制与性道德的严酷加以反抗”,并引以为同调,虽然他比周作人在性观念上更激进^②。1920年代中期之后,他的文化综合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调和的产物:重新赋予儒家生殖文化以现代意义并以其中庸之道来调和列宁主义的禁欲主义和罗素的自由主义。1940年代,他所鼓吹的以制度来保障婚姻和女性权利,就是其文化综合主义在现实政治层面的诉求。

张申府所鼓吹的“改人性”与“变制度”相辅相成的启蒙思路,在中国现代启蒙运动中可谓独特而深刻的。中国启蒙运动的目标从1920年代中期以后越来越趋向于“变制度”,而疏于“改人性”。这一趋向的副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形明显:没有了独立不依的个人,没有包括性观念在内的人性深刻变革,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是不会出现的。正如胡适曾经说过的,一个民主与自由的社会,是不能靠奴才建立起来的。这种副作用的巨大后果是:今天我们再来谈启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必须回归到五四时期的许多命题,重新补课。性爱启蒙就是其中的一个领域。

当然,张申府的性爱思想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尤其是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一个启蒙思想者与一个爱情的追求者,张申府的言行有着很大的差异。正如舒哲衡在《张申府访谈录》中探讨过张申府是否可称为“风流成性的妇女解放者”这一问题时所指出的,他像罗素(张申府的偶像)一样口称信奉男女平等,但行动上却从未落实^③。这其中的原因恐怕与其性爱思想的内在矛盾有很大关系。张申府一方面宣扬性的自由,人的独立,认为性的追求是无止境的。“男女相交非把凡可能者都作到了,必难认为圆满至极。男女交接,如果至极,而成定型,则罕有不断以乖离。”另一方面,他又认识到性的关系应该“执中”,应该在历史与自然两个方面打“双重折扣”。前者是他对西方启蒙思想的服膺,后者则是对“仁”的综合。当摇摆于这二者之间时,他就会在行动与思想之间出现矛盾。正如他所说:“人生矛盾之又一,即在男女的接合。”^④

(责任编辑:陆 林)

Zhang Shenfu's Theory of Sexual Love

XU Zhong-jia

Abstract: Zhang Shenfu's theory of sexual lov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s enlightenment thoughts. Sexual freedom and creative destruction are the main contents of his early thoughts on sexual love,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a strong anarchist color. However, his concept of sexual love in his later theory, favoring a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cultures, tries to discover a basis for a modern theory of sexual love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 e. the balance between reason and desire. In addition, unlike most revolutionaries, he believed sexual concept reform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 reform. This view on sexual love is of great practical value for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

Key words: Zhang Shenfu; sexual concept; multicultural comprehensiveness; enlightenment

①张申府:《报凯明先生》,《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75、76页。

②周作人:《与友人论章杨书》,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上)》,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第744页。另参见张申府的《报凯明先生》,当年因为“女师大风潮”,周、张二人文字往还数次。

③[美]舒哲衡:《张申府访谈录》,第102页。

④张申府:《所思四十》,《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161页。